

赵友林 ©著



《春秋》三传

书法义例研究

人民出版社



《春秋》三传

赵友林 著

书法义例研究

责任编辑:张兆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三传书法义例研究/赵友林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8
ISBN 978-7-01-009082-5

I. ①春… II. ①赵… III. ①中国-古代史-春秋时代-史籍
②春秋-研究 IV. ①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5511 号

《春秋》三传书法义例研究

CHUNQIU SANZHUAN SHUFA YILI YANJIU

赵友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7-01-009082-5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容简介

本书以《春秋》三传及其注疏为文本研究对象，通过穷尽式的材料分析，横向考察了传、注、疏所阐发的书法义例概况，纵向考察了书法义例在传、注、疏中的层累发展。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分析了三传及其注疏在阐发书法义例时所运用的不同的说解逻辑。同时，阐明了传、注、疏所阐发的书法义例对后世《春秋》学的影响。

序 一

赵友林君是一位性格沉稳而又坚毅的青年学者,1995年留校任教后,一直研习《春秋》三传,孜孜不倦,毫不懈怠,于三传中的《谷梁传》更是情有独钟,用力尤勤。2005年负笈津门,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赵伯雄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赵先生乃当今《春秋》学界的巨擘,无论学术造诣还是学术成就,敝人都是十分钦佩的。在赵先生的指导下,友林君在《春秋》学的研究方面有了长足进展,并将研究所得写成《〈春秋〉三传及其注疏之书法义例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友林君不但从纵向角度深入地考查了书法义例在三传及其“注”、“疏”中层累发展的情况,而且还深入地探讨了三传及其“注”、“疏”的说解方法及说解逻辑,同时又深入地分析了三传及其注疏的书法义例对后世《春秋》学的影响。在这些考查、探讨、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位青年学者所提供的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参考价值的新见解,为《春秋》学的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令人欣慰!

然而,《春秋》学领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层累地造成的问题实在太多。要较为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既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力所能实现的。既要大家共同努力,又要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平等交流,相互辩难切磋,从而使真相或道理,逐步清晰明朗,使

层累地造成的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此书出版之际,友林君索序于余,余欣然应允,缀文如上以为序。

王世舜

2010年元旦于京郊守拙斋

序 二

《春秋》作为儒家经典，是有所谓“经义”的，这一点似乎不必怀疑。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说得明明白白。但别的经典，经义似乎都能从经文中看出来，例如《尚书》，主张德治，就有非常明确的“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之类的文句，后人的发挥，总不至于太离谱的。《诗经》也是这样。什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什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什么“天命靡常”，经义就在经文之中。《春秋》则不同。从那干巴巴的大事记式的记事文字之中，很难发现有什么大义存在。了解《春秋》的义，全仗着“传”。于是《春秋》有“三传”之传。尽管三传解经的重点不同（《左传》以事，《公》、《谷》说义），但都关注于《春秋》的书法和义例，这一点则是相同的。那么什么是书法、义例呢？自来说法甚为纷纭，大致说来，书法是指孔子当年修《春秋》时的笔削之法、用字之法，《春秋》书什么，不书什么，记载某一件事情，用这个字而不用那个字，这样写而不那样写，据说其中都有深意在，都能表达圣人褒贬予夺的态度，这就是书法。至于“例”，实际上是一种记事的规则，同一类的事，用相同的手法记下来，这就形成了“例”，“例”里含有作《春秋》者所要表达的义，这就是“义例”。用书法、义例来说明大义，是三传（特别是《公》、

《谷》二传)解说《春秋》的主要方法。

书法义例这种东西,到底有没有,古人也有争论。当初孔子作《春秋》时是否预设了种种书法、义例,然后再进行“笔削”,确也令人生疑。南宋高宗时期有一位学者叫洪兴祖,他曾运用譬喻之法,道出了自己对义例的理解,他说:“《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意思是说,天本身是自然之物,固无所谓“度”,但历家测天之时,必设周天之度数才能够将天象之种种变化加以说明,所以这些看似人为的“度”,实为言天者所必不可少。这样说来,就算是孔子当初作《春秋》的时候,并不曾预设诸如弑杀攻伐、称名称字种种之例,但后来解释《春秋》的人,却不能没有“例”,“例”是后世经师解说《春秋》的一种工具,正如周天度数是言天象历法的人必不可少的工具一样。这反映了古人即使不承认书法义例为《春秋》所固有,也很难摆脱这种解说经义的方式。不管怎么说,古人大多用书法义例来解说《春秋》,这种解说足以反映古人的思想方法与价值观,从而构成《春秋》学的主体内容,总是事实。因此,对三传所发挥的书法、义例,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是三传对书法、义例的解说,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或者说得过于简略,或者说得不够明白,或者失之于浅,或者失之于陋,于是有儒者出,为之作注。本来为三传作注者都不止一家,但完整传至今日的,则《左传》有杜预注,《公羊》有何休注,《谷梁》有范宁注,三家而已。三传的注对书法、义例做了归纳、剔发,同时也有扩充,许多传中没有明说的东西,到了注家口中,也成了“例”。于是注家的书法、义例,往往比传要丰富得多。南北朝到唐代,义疏之体流行,三传都有了疏。疏是以一个注本为主体,对经文、注文再做更细致、深入的讲解和阐发。宋代以后,《左传》杜预注孔颖达

疏、《公羊传》何休注徐彦疏、《谷梁传》范宁注杨士勋疏,被人合刻在一起,成为一种固定的读本,影响至为深远。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春秋》一经,下有三传,每传各有一权威的注,每个注本都有一唐及唐以前人所作的义疏。治《春秋》之学的人,除了“舍传求经”的一派,无不对传、注、疏重视有加,同时也都对传统《春秋》学中的书法义例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旧时的经师,视《春秋》为神圣的经典,抱着信仰的态度,讨论《春秋》中的书法、义例,他们囿于家派之见,往往缺乏历史的观点,将传、注、疏笼统地看作是一家之言,例如讲《公羊》之义,每每据何休之言立说,似乎何休之说就是《公羊》大义。今之学者则不然。今日的学者,已有可能跳出经学的圈子之外,纯粹以学术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有关书法、义例的种种议论,做出比较客观的、有科学性的判断。摆在读者面前的《春秋三传书法义例研究》,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本书的作者赵友林,2005年考入南开大学,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友林勤勉力学,好为深沉之思。大约是受了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启发,他认为《春秋》三传的书法、义例系统,也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层累地”形成的。起初,三传构建了各自的书法、义例系统,后来,三传的注、疏沿着三传所开创的说解路向,又做了层层补足、弥缝与扩充工作,使之更有条理,更加系统化。这种书法义例的层累发展,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各自在不同的阶段,按照某种内在逻辑的推衍,是不同阶段说解的一种有机的融合,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更为完备的诠释系统,以致常常使人误以为注、疏所说都是三传本来之义。那种据何休之言来评价《公羊》思想的情况,在旧时的学者中并不罕见。

友林的这本书,对三传及其注、疏分别加以考察,先三传,再

注、疏,使不同层次的书法义例不相混淆,许多原本看似朦胧混沌之论,变得清晰起来,使人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之感。作者还对三传及注、疏书法义例的构建形式及逻辑方法进行了考察,同时也指出了三传书法义例的内在矛盾。看得出来,作者的工作是在踏踏实实钻研原典的基础上完成的,非一般东拼西凑、浅尝辄贩者可比。作者深入分析了经传及注疏中的大量实例,力求做到言必有据,不发空论,这种笃实的学风是值得提倡的。

友林离开南开园已有两年,日前接到他的电话,说他的这本书即将出版,我很为他高兴。我知道,一个青年学者,能够不为世俗的浮华搅动心境,坐上几年的冷板凳,埋首于故纸堆中,钻研一些远离现实生活的课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研究的成果能够出版,得到社会的认可,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鞭策。而学术园地中又出现一朵新花,亦属可喜可贺之事。欣喜之余,也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友林学术生涯的新起点,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探索,会有更多更好的新成果问世。我期待着。友林让我在书前写上几句话,我很乐意,于是坐在了电脑桌前,敲出了以上这些文字,就算是序吧。

赵伯雄

2010年4月序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寓所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3)
 绪 论	(1)
一、《春秋》三传及其注疏	(1)
二、书法、义例等概念的分析与说明	(17)
三、研究缘起	(26)
四、文献综述	(29)
五、基本思路和创新之处	(42)
第一章 三传书法义例的构建	(45)
第一节 《公羊》书法义例的构建	(45)
一、《公羊》所阐发的书法义例概况	(45)
二、《公羊》对书法义例的构建	(50)
三、《公羊》的书法义例与《公羊》经义	(62)
第二节 《谷梁》书法义例的构建	(71)
一、《谷梁》所阐发的书法义例概况	(71)
二、《谷梁》对书法义例的构建	(74)
三、《谷梁》的书法义例与《谷梁》经义	(87)
第三节 《左传》书法义例的构建	(94)

一、《左传》所阐发的书法义例概况	(94)
二、《左传》对书法义例的构建	(97)
三、《左传》的书法义例与《左传》经义	(104)
第二章 三传之“注”对书法义例的弥缝与深化	(109)
第一节 何休对书法义例的弥缝与深化	(109)
一、何休所阐发的书法义例概况	(109)
二、何休对书法义例的弥缝与改造	(111)
三、何休对书法义例的修补和拓展	(120)
四、何休对经义的阐发	(126)
第二节 范宁对书法义例的弥缝与深化	(130)
一、范宁所阐发的书法义例概况	(131)
二、范宁对书法义例的弥缝	(132)
三、范宁对书法义例的修补与拓展	(137)
四、范宁对经义的阐发	(141)
第三节 杜预对书法义例的弥缝与深化	(144)
一、杜预所阐发的书法义例概况	(145)
二、杜预对书法义例的改造与弥缝	(146)
三、杜预对书法义例的修补与拓展	(152)
四、杜预对经义的阐发	(155)
第三章 书法义例的层累效应及注疏对书法义例的 调整	(160)
第一节 三传之“疏”与书法义例的层累效应	(160)
一、三传之“疏”所阐发的书法义例概况	(160)
二、三传之“疏”与书法义例的层累效应	(164)
第二节 三传“注疏”对书法义例的调整	(177)
一、三传“注疏”的相互批驳	(178)

二、三传“注疏”的相互吸收·····	(185)
三、三传“注疏”对书法义例的反思·····	(192)
第四章 《春秋》三传及注疏阐发书法义例的逻辑	
方法考察 ·····	(207)
第一节 《春秋》三传阐发书法义例的逻辑方法	
考察·····	(207)
一、三传阐发书法义例的逻辑方法·····	(207)
二、三传书法义例的逻辑形式·····	(211)
三、三传阐发书法义例的内在逻辑矛盾·····	(217)
第二节 三传注疏阐发书法义例的逻辑方法	
考察·····	(223)
一、三传注疏中的属辞比事·····	(223)
二、三传注疏阐发书法义例的逻辑方法	
分析·····	(239)
第五章 三传及注疏之书法义例对后世《春秋》学的	
影响 ·····	(244)
第一节 后世《春秋》学者对书法义例的反思 ·····	(244)
一、疑经与书法义例的重新探求——唐代学	
者对书法义例的认识·····	(244)
二、书法与史法的并存与对立——宋代学者	
对书法义例的认识·····	(248)
三、书法与史法的调和——元明学者对书法	
义例的认识·····	(262)
四、清代学者对书法义例的认识·····	(269)
第二节 《春秋》学者对属辞比事的再认识 ·····	(279)

结 语	(296)
参考文献	(302)
后 记	(311)

绪 论

一、《春秋》三传及其注疏

(一)《春秋》及三传

1.《春秋》

《春秋》相传是孔子依据鲁史而作,其中寄寓了孔子的褒贬大义。这种认识最早见于《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认为,春秋时期,王纲失坠,社会混乱,孔子感于时事,因鲁史而作《春秋》,寄寓大义,贬抑乱臣。此后,司马迁又对《春秋》与鲁史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①也就是说,孔子作《春秋》虽因鲁史,但也作了一些加工,有所因袭,也有所刊削,此即“笔则笔,削则削”。

孔子笔削鲁史,以寄托微言大义,但其义却隐而不彰。《春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4页。

秋》大义最初是由孔子通过讲授的方式在其弟子中传播的,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承其师说而递相传授,而《春秋》大义也在传授的过程中不断增加,从而也渐离其真。对于这种情况,刘歆曾说:“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①在这一过程中,《春秋》之学逐渐形成了几个派别,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大约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和夹氏。其中邹氏无师,夹氏无传,因此只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流传至今。

2.《左传》

《左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班固在自注中认为其作者是鲁太史左丘明。班固之说盖本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为左丘明所作之说,至唐代开始有人怀疑,其后众说迭起,但迄今也无定论。关于《左传》的成书,赵伯雄先生依据《左传》中的预言,推定《左传》大约成书于公元前375—公元前343年之间。^②《左传》成书之后,便开始在学者之间流传。关于《左传》的传授系统,孔颖达引刘向《别录》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③

今本《左传》,从其内容看,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叙事,以交代《春秋》所记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类在《左传》中最多;二是阐发书法义例以明大义;三是以“君子曰”的形式对人事作出评价。因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8页。

②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页。

③ 《春秋左传正义》之杜预序、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3页。

此,从其体例内容上看,《左传》是阐释《春秋》经的。但是《左传》的这一性质却在汉代遭到了今文经学家的否定,认为《左传》不传《春秋》。至宋代有人提出《左传》是刘歆伪造之说,在此基础上,清代刘逢禄又作了详尽考证。现代学者虽早已不信刘歆伪造之说,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左传》原本就是记事之书,与《春秋》无关,其中的解经语是后来增窜的。对这种观点,赵伯雄先生作了批驳,认为《左传》从一开始就是为解经而作,“其排纂史料与撰写解经语是同时进行的”^①。

3.《公羊传》

《公羊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一卷,班固认为其作者是齐人公羊子,至于其名则不得而知,而颜师古注为“名高”。颜师古之说盖本东汉戴宏之说。徐彦在疏解何休《公羊传解诂序》时引戴宏之语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在这里,戴宏勾勒了《公羊传》的传授系统,即最初由公羊高向子夏问学,后经五世单传,至汉景帝时始著录成文。对于这一传授系统,前人已指出其可疑之处,大约有两点,一是《公羊传》之传承不可能是在公羊家族内一线单传,在公羊子之外,也应有其他先师,如四库馆臣曾指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②二是公羊高到公羊寿这几百年间仅传五代,实不足信^③。对此,赵伯雄先生在现

^①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②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崔适:《春秋复始》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民国七年北京大学铅印本,第381页。